

苏联劳动者 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 創造主动性

郭 增 喜

时代出版社

Д. Н. Коган
ТВОРЧЕ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ТРУДЯЩИХСЯ СССР
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 — 1955

内 容 提 要

本書首先說明整個社會的存在和發展，主要是依據人民羣眾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人民受到殘酷的迫害和摧殘，因此他們在生產中的創造主動性被扼殺了。而在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蘇聯，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人民羣眾的創造力量被喚醒了，他們以忘我的勞動，為祖國積累財富，從而也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本書又着重指出，在社會主義生產中，羣眾創造主動性之所以能够得到發揮，也在於共產黨的鼓舞和組織作用。因為黨把關心人民福利視為最高準則，黨能利用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為提高人民生活而努力。

时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發行許可證出字第45號

(北京阜外百万庄出版大樓)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制。北京大華裝訂廠裝訂

1955年9月北京初版 1955年9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4/32 字數：24千字

1—9,500册 定價：70.12元

目 次

資本主義社會里羣衆的創造主動性受到壓制.....	2
社会主义制度是羣衆在生產中的創造積極性不斷高漲 的基礎.....	7
社会主义競賽是羣衆創造主動性的突出表現.....	18
共產黨是社会主义生產中羣衆創造主動性的鼓舞者和 組織者.....	27

資本主义社會里羣衆的創造主動性受到壓制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社會的歷史是生產的歷史，是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歷史。藉助於勞動工具，並且依靠自己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人，是生產力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說，社會的歷史首先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的歷史，是劳动羣衆的歷史；是人民的歷史。

劳动羣衆是推動歷史進步的主要力量。人民羣衆的勞動使整個社會有可能存在和發展。人們的勞動不僅創立了人類物質文化方面的，同時也創立了精神文化方面的最偉大的業績。

卡尔·馬克思指出，勞動“是人類生活的永久的自然條件，所以和人類生活的各種形態無關，在人類生活的各種社會形態上都是適用的”❶。但這絕不是說，在所有的社會經濟形態中，社會勞動組織和勞動性質都是一樣的。

每一種社會制度都有自己的、僅為這種社會制度所固有的社會勞動組織，它並不以人們的意志和意識為轉移，而是客觀形成的。它是由該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所決定，視生產資料掌握在誰手里，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以及社會產品分配形式和原則如何而定。由此可見，決定工作人員的勞動態度的，並不是在該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對勤勞或懶惰的概念的影響，也不是唯心主義哲學家牽強附會地證明的所謂“天才們”的特別“情緒”，而是社會的勞動組織。

勞動按其本質來說，就是創造。恩格斯曾經寫道，人在勞動

❶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00頁。

中滿足着自己对創造活動的自然而然的渴望。人们为了要改变自然，使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而在劳动过程中创造性地影响着自然。但是，在有剥削的社会里，劳动的这种创造性的实质是和它的社会組織相矛盾的。¹ 在有剥削的社会里，劳动是粗鄙的，是强迫劳动，群众在劳动中的創造主动性被抑制和扼殺着。恩格斯指出：“如果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熟知的一种最高的愉快，那么被迫的工作便是最残酷的、最屈辱的痛苦，还有什么比每天必须从早到晚做你自己所反对的事更可怕呢！”² 工商业里资本主义本資本，虽然从奴隶占有制过渡到封建制度，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劳动組織起了本質上的变化，但在發生这一切变化的时候，一切对抗性形态所固有的共同的特征遺留了下来。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对人的剥削仍然存在，因而，在所有这些形态中，劳动保存了强制的性质。封建制度下的刑棍紀律，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被飢餓紀律所代替了，但是，对劳动的强制性依然沒有改变，因此对劳动的态度也还是和过去一样，把劳动当作一种强迫的和艰苦的職責。³ 任何一种剥削制度都不能保证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得到穩固可靠的物質利益。例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绝大多数工人的工资低得不能保证他们支付最低的生活費用。工人为了生存，必須每天竭尽全力劳动，用瘋狂的工作速度折磨自己。这一切只是为了得到僅能使收支相抵的極少的报酬。在资本主义国家，所有的工人劳动工资制度都是榨取血汗的手段，都是对劳动群众進行野蛮剥削的手段。⁴ 莫尔富氏“王大”車
天几洗车机小几用脚出。便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新机器的採用使失業現象日趋嚴重，便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410頁。

工人階級的處境進一步惡化。工廠主對機器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促使加快工作速度，不斷催促工人趕快工作。例如，法國布朗尼的“卡爾諾”罐頭工廠採用了一些自動機器，一個女工每分鐘必須向自動機器內投放350張白鐵片，每小時就是21,000張。由於這樣的勞動速度，經過若干年以後，勞動者便成了失去勞動能力的人。美國福特汽車工廠每年總要重新招收10萬人來代替因失去勞動能力而被解僱的工人。在現代的美國汽車工業里，工人的勞動期間平均只有5年。

不錯，在資本主義企業里也有工人超過定額的個別事實。但是這些事實僅足以說明工人不過是为了力求賺取即使是很少的錢，以求擺脫貧困和他們對解僱與失業的恐懼。1950年5月5日的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工人日報”刊載了一篇論文，題目是“最好的刺激物——對解僱的恐懼”，文章中寫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最好的刺激物並不是什麼獎金制度，而是對解僱的恐懼。”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機器的採用不斷地把男工和熟練工人從工業中排擠出去，而尽可能用女工和童工，以及文化不高、未受過訓練的工人來代替他們。利用工人去執行几乎不需要消耗任何智力的簡陋的、不復雜的操作，對資本家是有利的。只要化一兩天的時間就能教會工人去執行這些最簡單的操作。這樣的工人也容易由街頭搜羅來的其他任何人所代替。但是，讓工人不斷地去從事這種簡陋的、單調的、不需要任何智力的工作，便剝奪了具有某種精神內容的勞動。工人失去對勞動的任何興趣，他每天只是機械地重複着令人厭煩的、單調的動作。

汽車“大王”百萬富翁亨利·福特曾經滿意地指出：他工廠里的大部分工人沒有進過任何學校——他們用幾小時或者幾天便學會了自己的行業；在他工廠里所完成的全部工作中，有43%只要一天時間就能學會，36%的工作，有一天到八天的時間也能

学会了。技术装备的工人——一个盲目的包装工人。项目

对资本家来讲，不讓工人学习，不僅可以节省金錢，並且能讓資本家使工人永远处在对解僱的恐怖之中，使工人停留在愚昧無知的阶段。

雇用女工和童工可以減低工資，况且当發生罢工和風潮等事件时，对资本家来讲，妇女和兒童要“安全”得多。例如在美国，参加生产的妇女人数1947年就比1900年增加了兩倍。而且不僅是美国，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断地加强利用不熟練的劳动。工人的熟練程度和知識越低，他們在劳动中表現自己的主动性和創造思想的可能性也越小。

资本家企圖用超额獎励工資使工人有兴趣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事实上这种獎励工資成了对工人最肆無忌憚的掠夺，成了獲得附加剩余价值的來源。

在美国的企业里，產量增加80—100%，而所支付的獎金不超过計时工資的20—30%。在法國实行着一种制度，正如法國工会訪苏代表团团员雷納·福尔与苏联青年工人的談話中所說的，根据这一制度，工人超計劃制造每一零件所得的报酬要少於制造計劃中規定的每一零件所得的报酬（按遞減比率）。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產組織的“科学制度”，例如泰罗制度、福特制度的目的，是依靠損害工人的利益，依靠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降低劳动报酬來尽量地增加剩余价值，減少生产費用。列寧在“泰罗制度——机器对人的奴役”一文中揭露了这种制度的本質，指出它是榨取工人血汗的“科学”制度。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在那里工作的那个企业或公司的生产是降低还是增加，居民对该公司所出产的商品的購買情况是好是坏，这些都与工人无关。工人所生产的產品，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僱傭劳动与資本”中所描寫的一样，并不是工人工作的

目的。工人劳动的目的只有一个——从饿死和贫穷的处境中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可是不，~~ 哪怕人工高不，~~高來~~ 资本資本这样，资本主义残酷地侵吞着最重要的生产力，压迫和摧残着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者——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普通人的创造主动性，歪曲并毁损着劳动过程。~~而工农群众~~，但是剥削压迫的时代并不能在人民群众中扼杀对劳动的尊重，对知识和高度技术的追求。乌拉尔人老共产党员叶尔马科夫在“矿工回忆录”一书中谈到青年如何渴望从有经验的矿工那里学到技能和工作方法，前辈们的技能又如何使青年讚歎不已。巴若夫在他出色的故事中谈到，不仅是采用手工方式的琢磨工，就是在那角祖传的技術裝备起来的古老工厂里，也出了获得世界声誉的钢铁的冶金工人，也把“事業的发达”看得很重。定事而，尊重自己的劳动，在提高工人的階級觉悟方面有巨大的意义。工人知道，劳动能使他和寄生者——有产者、地主区别开来，劳动能使他高过他们。在劳动人民群众的心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物质财富创造者的合理的自豪，为自己具有“劳动的高尚习惯”而感到骄傲。所有这一切终于产生了一种信念，就是劳动的成果应该归于劳动者，而不是永远属于懒惰的地主或资本家所有。工人越是了解他的劳动对世界历史的意义，他就越加憎恨压迫和摧残劳动的剥削制度。

~~共产党教导我们：要重视普通人的劳动，要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感到自豪，要坚信自由劳动的伟大未来。共产党曾发动劳动者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党过去和现在都教导说，管理国家的应该是劳动人民，而不是那些窃取别人劳动的寄生者。劳动果实应该属于劳动的人，管理国家的应该是劳动者。~~ 这一明确的、群众深感亲切的思想将成为鼓舞千百万人起来斗争的思想武器。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将劳动人民从剥削重压下解放出

來，才能消除阻碍人民羣衆表現高度創造主動性的那種情況。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根本改變勞動的性質，因而也就根本改變人對勞動的態度。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使羣衆的創造積極性和主動性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度。

社會主義制度是羣衆在生產中的

創造積極性不斷高漲的基礎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歷史的轉折點，是新歷史時代的开端，它喚醒了羣衆的創造力量，引導勞動者走上了新生活的獨立創造的道路。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區別之二，在於消滅了一切人對人剥削的無產階級階級利益是與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相一致的。在過去的那次革命中，剝削階級為了夺取政權總是首先利用羣衆摧毀舊有的社會制度；正是由於人民羣衆英勇斗争的結果而夺取了政權以後，這些剝削階級便採用一切手段來壓制人民在革命中鮮明地表現出來的創造積極性，使人民羣衆成為自己意志的順從的执行者。

例如，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所以能獲得勝利，只是因為資產階級能把自己廣大的人民羣衆發動起來反對封建制度。但是，在剛剛取得勝利以後，資產階級便把勞動人民列入“消極公民”的行列。拿破崙在1791年又公布了勒·沙波利法案，禁止工人集會和結社。平水山半1913年總會業工大會表爭1994年。塞爾南大喊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工人階級在革命斗争中有廣大勞動羣衆形成的聯盟日益加強。工人階級專政的要點之一，在於利用無

產階級政權來使勞動羣衆脫離資產階級，巩固工人階級與這些羣衆的聯盟，引導他們參加共產主義建設。卡爾·馬克思和恩格爾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與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有根本上的區別。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目的是使國家政權適合於已有的、在封建制度內部自發的資產階級的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為了要完成這一項困難程度來講是史無前例的任務，就必須吸引千百萬的勞動羣衆。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不僅動員人民來推翻舊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且還動員人民來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的建立，是人民羣衆在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領導下創造性活動的結果。黨所領導和指導的羣衆在自己的活動中利用着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尋找適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人們經濟联系的新形態，用巨大的勞動“把包括千百萬人生存必需品之有計劃生產和分配的這一極繁雜而極精密的新組織系統辦理就緒”^①。這就是實現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經濟規律的要求。

我們祖國在發展社会主义生產中的一切成就是千萬勞動者發揮創造積極性和英勇精神的結果。共產黨領導下的勞動者在短期內就使我們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先進的、經濟上雄厚的、強大的國家。1954年苏联大工業的總產額與1913年的水平相比（按比較價格計算）超過了34倍。生產資料的生產差不多增加

^① 本“列寧文選”兩卷集，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73—374頁。

了59倍，電能生產增加了74倍以上，而機器製造的產額則超過了159倍以上。將群衆的創造性發揮到極點，蘇聯主義會擁

千萬工人羣眾和集體農民的積極性、忘我精神、熱情和主動性，黨的英明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以及在這一基礎上提高農業、大大發展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決定性因素。

勞動羣眾的主動性在發展我們社會的生產力方面過去和現在都具有很大的意義。在我們這裡，改善生產工具不僅僅是發明家、科學工作者和設計師的事，——應特別着重指出——而且是普通工人和農民的事。在1952—1954年之間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議和改進措施就有255萬件之多，這就是很好的證明。與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同時，蘇聯人的文化水平和覺悟程度也在不斷地增長。

在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方面，羣眾的創造積極性的作用特別巨大。羣眾的實際經驗幫助黨找到了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形態。根據工人的倡議在社會主義企業里實行了計件勞動報酬制；由於國營農場的一羣普通工作人員的發起在1927年建立了第一個拖拉機隊，即現在的機器拖拉機站的雛形；在集體農莊里採用勞動日來計算勞動和分配，也是羣眾集體經驗的結果。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在城市和鄉村中的確定是必要的條件，但如果沒有它，羣眾的創造主動性就不可能完全表現出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是擺脫了剝削的人們的同志合作和社會主義互助的關係，這種關係根本改變了勞動的性質。在剝削制度下，勞動是沉重的可恥的負擔，是為了剝削者而進行的強迫勞動；與剝削制度相反，在蘇維埃社會中由於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確立，勞動是不受剝削的勞動，是為自己、為自己的社會而進行的勞動。蘇聯憲法保證蘇聯公民享有勞動權和接

照數量及質量支付勞動報酬的權利。這些權利由於國民經濟的
社會主義組織、蘇維埃社會生產力的不斷增長、經濟危機的可能
性的消除和失業現象的消滅而得到切實的保證。

在蘇維埃社會中，新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的勞動性質以立法手續在苏联憲法第12條中固定下來：“按‘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勞動是苏联每一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應盡義務。有光榮事業。”

在我們國家里消滅了人剥削人階級現象，並把勞動變成了光榮的事業、榮耀的事業、豪邁和英勇的事業，這就保證苏联人能表現出最偉大的勞動創造性和積極性，以便更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勞動具有愈來愈多的創造性。
同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勞動還沒有像將來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那样成為生活上最迫切的需要。

這一切說明，在社会主义階段，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余尚未徹底克服，還保存着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工人勞動和農民勞動間、熟練勞動和簡單勞動間的重大差別。由此可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人員從物質利益上关心自己勞動成果和关心生產發展的原則具有重要的意義。更明顯地說，
如果社会主义所有制把人們聯合在一起，真保證他們利益的共同性。在社会主义社會，每個勞動者、物質資料生產者的利益是和整個社會的利益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生產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在這裡每个人的勞動是必要勞動，因為勞動的一部分用於滿足公共的需要，用來為整個社會的利益服務，也就是為每個勞動者的利益服務，而另一部分直接用來滿足勞動者的個人需要。社会主义社會关心這兩部分的增長，关心整個社會生產的發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共財富的增加可以改善每個勞動者的物質福利。可見，在我們的社會里

個人的福利是與公共的福利分不開的，並且很和諧地結合在一起。

社会主义社會自覺的勞動者很明白，每一次生產的改善會使勞動生產率提高，也就是說能增加社会主义祖國的公共財富。有可能發展大工業，鞏固國防，不斷地降低人民消費品的價格。可以抽出越來越多的資金用於住宅建築和文化建設，用於國民教育和保健事業，用來作勞動者的社會保證等等。這些也正是使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每一条合理化建議的社會結果。

對蘇聯工人來講，他的個人勞動是和他所在的整個企業的工作分不開的；他不可能用漠不關心的態度來對待他那個工廠出產的產品的質量；不僅對他所在的工段、車間，就連對鄰近車間、整個工廠、整個工業部門生產計劃的完成情況他也不能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自覺的集體農莊莊員明白，他的個人福利首先取決於集體農莊整個公共經濟的情況。所以我國每一个自覺勞動者的創造主動性是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改進整個工廠、國營農場，集體農莊的工作質量的。僅在1952年一年之內在各種生產會議上所提出的改進企業工作的建議就有1,000萬條以上，這些建議中有800萬條被採納了，並且已運用到生產中去。

共產黨和蘇聯政府使羣衆的創造主動性用來尽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列寧認為提高勞動生產率有頭等重要的意義。還在蘇維埃政權開始建立的時候，列寧就說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建設新社會的根本任務。他寫道：“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那些自願、自覺、聯合著的工人所創造出舊資本主義更強的勞動供給。”

列寧文選（兩卷集，195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592頁）

曾經使我們的工業在極短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率增長方面能具有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速度。

在最近的25年中，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大約提高了5倍。建築業和鐵路運輸業的勞動生產率大約提高了2.5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勞動生產率比革命前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大約高2倍。勞動生產率能增長得這樣快，是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從來也沒有過的事。大家都知道，在美國近22年（1929—1951年）來，勞動生產率每年平均只提高1—1.2%！

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社會主義工業的蓬勃發展，是城鄉勞動生產率高漲的客觀條件。新技術能夠排擠生產率低的手工勞動，減輕人的勞動，它給工作人員開辟了表現主動性和靈敏性的無限廣闊的余地。例如，當“頓巴斯”牌聯合採煤機的第一批樣品出現時，就有25,000多名工人、工程技術人員提出了改進這批聯合採煤機的合理化建議。現代形式的生產革新運動是與新技術有機地聯繫着的。

共產黨對優先增長生產資料的生產、對發展技術表示了不倦的关怀，因而它就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不斷提高羣眾的創造主動性創造了必要條件。

但是，單單採用一種新技術，並不能解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問題。一切都取決於這種新技術是否被正確地、合理地利用起來，支配新技術的人受訓練的程度如何，也取決於這些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新技術也要有新的、更完善的勞動組織，和能够很好地掌握這種技術的受過訓練的干部。在煤炭和森林工業的一些企業里，雖然技術裝備已大大增加，但是勞動生產率在1954年仍然低於戰前水平。現在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仍然落後於五年計劃所規定的任務。這特別說明了在許多經濟部門里對新技術利用得很不够。例如，庫茲涅茨克冶金聯合工廠的一號平爐和馬凱

叶夫斯克冶金工厂的四号平爐是一樣的，但是庫茲涅茨克的冶金工人所煉出的鋼却多出40%。能達到這樣的成績，乃是由於有了能使工人羣衆充分發揮其大膽的創造主動性的良好勞動組織。苏联業企首科委會常任秘書長（1953—1959） 宝列西耶夫

黨教導我們組織羣衆，提高他們的主動性，使這種主動性用於掌握新技術和發掘生產潛力。謝洛夫冶金工廠（謝洛夫城）的經驗證明這一點對提高勞動生產率具有何等的意義。該廠的整個冶金循環提前完成了1954年的計劃：生產革新者們達到世界實踐中最好的熔鐵爐有效體積利用系數。沒有任何巨大的基本投資，仍然利用同樣的設備，1954年生鐵、鋼的熔鍊水平和鋼材生產水平較1946年差不多提高了1倍。蘇聯裝對

相反地，凡是勞動組織的社會主義原則遭到破壞，衝鋒主義在發展、工作進度表遭到破壞的地方，凡是不关心盡量利用技術，還採用陳舊的平均統計的生產定額的地方，勞動生產率一般增長得很慢，勞動者的創造積極性也不高。蘇聯裝對

社会主义的生產關係使每個勞動者經常关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关心社会主义生產合理化。根據按勞動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則，任何一條旨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減輕勞動並使其健全的合理化建議或改進措施，都可以得到物質獎勵和支持，因為它是對整個社會有利的。“按勞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則保證羣衆的創造主動性和獨立性能不斷提高。列寧著

一貫執行每個勞動者從物質利益上關心自己勞動成果的原則，是羣衆創造積極性增長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列寧教導說：重視優秀的人物並對他們進行物質獎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社会主义勞動生產率的必要的刺激劑。他寫道，“突擊就是着重，着重而沒有在消費上的着重，就等於一無所有。”列寧著

① “列寧文集”，人民出版社版，第6冊，第364頁。

當時人民委員會法令“工資問題的主要條例”（1921年）中規定，工人的工資應該隨着工作成果的提高而提高。自从列寧簽署該項法令之日起直到蘇共中央全會有關農業問題的一些歷史性的決定（1953—1955年）為止，黨始終关怀着企業和每個勞動者在物質利益上关心其劳动成果這一原則的貫徹。

（蘇共中央九月全會（1953年）再三地強調指出：蘇聯的党和蘇維埃組織對鞏固物質利益的原則最不注意，尤其是直接破壞了這一原則，則平均主義因素便開始流行，勞動生產率便下降，羣衆的創造積極性也便降低。畜牧業、馬鈴薯和其他農產品生產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破壞這同一社會主義原則。本基

當“按勞取酬”這一經濟規律尚發生作用時，對個人物質利益的关心現在是、將來也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強有力的工具，是蘇聯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高漲的重要槪稟之一。党和蘇維埃國家所採取的關於消滅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因素和大大提高集體農民、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工人從物質利益上关心自己劳动成果的決定性辦法，引起了蘇維埃農村勞動者創造主動性和熱情的巨大高漲。

根據蘇共中央一月全會的決定，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所通過的“關於改變農業計劃工作方法”的決議，便是黨為提高共產主義建設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开辟了廣闊余地的一個例子。以前編制計劃的實際方法是過分集中的，只是規定將大量的計劃指標送達到集體農莊，這種方法並不是國家所必需的，它阻礙了地方主動性的發展。計劃工作的新制度規定，農業生產計劃應該直接在集體農莊與機器拖拉機站里以及在國營農場里開始編制。決議並規定，經集體農莊管理處與機器拖拉機站所制定的作物播種計劃和畜牧業發展計劃要在莊員大會上評論和批准。今天，每一個集體農莊員、機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的工

作人員都要參加工訂農業計劃的工作。毫無疑問，而制訂農產品生產計劃的新制度是提高羣眾主動性和創造性的重要刺激物。

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主动性不僅与物质利益有关，而且是与苏维埃政权和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培养起来的偉大思想联系着的。苏联人民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苏维埃爱国主义，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鼓舞着苏联人去建立劳动功勳，去进行忘我的劳动。

加里寧寫道：“假使去承担每一件單獨的事業，它是非常实际的，也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在它的里面还蘊藏着能深深地感动人們心弦的最崇高的理想，这事業感染着我國的千百万羣衆，这些理想使我們所有的工作，从集体農民的工作开始直到最崇高的藝術家的工作为止都變得高尚起來。”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觉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所理解的个人物质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意味着对暴富、貪慾和个人主义的追求。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个人物质利益是以自觉性为基础的，是和蓬勃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融合一致的。自1919—1920年，正是劳动者的这种社会主义自觉性和革命热情鼓舞了他們在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里創立了劳动功勳。也正因为如此，在偉大衛國戰爭时期工人們顯示出了劳动英雄主义的奇蹟。而这种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热情現在又在苏联人和平的、“日常的”建設性劳动中顯現出來了。

苏联人民集体英雄主义最偉大的表现是超额完成党 and 政府所交给的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任务。到1954年底自愿去开垦生荒地的就有25万人以上。在1945年曾經預計开垦1,300万公

① 加里寧：“1936—1937年論文和講演集”，俄文版，第104頁。 ●